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前后

□ 汤 涛

刘少奇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后，正当中国人民处在新的历史变化关头的时候，他为大会的筹备与召开、为大会路线的贯彻执行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作出了巨大贡献。

协助毛泽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少奇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交付的各项艰巨任务。1943年春，他奉命回到延安。其后，他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成为毛泽东的一位主要助手，协助他领导进行了延安整风等多方面重要工作。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通过了刘少奇关于以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提议；同时决定，全会期间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

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刘少奇继续把全部的心血投入到党的各项工作中。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协助毛泽东从容应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上。进入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为挽回败局，日本侵略者犹作困兽之斗，于4月中旬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一败千里，短短8个月丢失了约2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146座大小城市。一时间，民怨沸腾，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全面的政治危机。

面对时局的剧烈变化，刘少奇参与领导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6月23日，他与陈毅电示新四军：“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绥辑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西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此后，他又和毛泽东、陈毅等同志一起，多次致电有关方面，对如何在河南、湘鄂赣和苏浙等地区开展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他还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许多著名的军事行动。如1944年秋，党中央决定派南下支队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执行开辟新根据地等战略任务。刘少奇参与负责了相关准备工作，并对部队行军途中诸多事项给予关怀指导。

在这段时间中，刘少奇工作安排得格外充实，他密集出席各种重要会议，为中央起草大量文电，和相关同志进行工作谈话，在加强城市工作、加强根据地生产和政权建设等诸多重要问题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参与领导七大筹备工作

在七大筹备过程中，刘少奇承担着非常重要的领导职责。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准备召集中国共

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时，刘少奇即为25名委员之一。后来，由于战事紧张等原因，大会屡有延期，但刘少奇始终对大会的筹备予以高度关注，并做了许多工作。如1940年8月，时任中原局书记的他专门对华中中的七大代表作报告，大大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1944年5月，他还参加了任弼时负责召集的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等等。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师哲回忆道：“可以说，七大前后是少奇同志在延安工作繁忙的一段时间。为了开好这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少奇同志曾集中精力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在刘少奇承担的工作中，有一项尤其广为人知，那就是主持修订党章和起草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党的七大准备工作时，决定由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为完成这项工作，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刘少奇撰写的许多著述都是党建理论的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更是曾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典教材。此时，刘少奇又特意对党的建设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并在为中央派往外地工作的干部作报告时围绕民主集中制、群众观点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刘少奇还多方收集各种资料，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1945年2月，他为中央组织部起草致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电，指出七大即将举行，要求各地电告“党员总数（部队党、地方党及沦陷区党）”。经过统计，中央不但对全党人数有了准确了解，而且根据各地党员的具体人数，相应调整了七大代表名额。经过艰辛努力，特别是反复的集体讨论修改，相关起草工作稳步推进。草稿脱稿后，刘少奇还专门于3月7日主持召开党章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刘少奇负责起草的党章草案经过认真讨论后，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为七大胜利召开和大会路线贯彻执行作出卓越贡献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开幕。在毛泽东致开幕词后，朱德、刘少奇等同志先后发表了讲话。对这次“盼望了多少年的”大会的召开，刘少奇满怀喜悦之情，他明确指出：“我们大会应该动员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为着新中国光明的前途而斗争”。大会期间，刘少奇做了大量领导工作。在大会召集的21次全体会议上，他先后两次担任会议执行主席。这两次会议都承担了重要议程：前一次听取了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第二次则听取了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以及周恩来关于选举条例草案的解释，通过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刘少奇还多次参加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以及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参与讨论决定了诸多事宜，对大会的顺利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5月14日和15日，刘少奇用了整整两天时间，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系统论述了党的性质等重大问题，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完整概括和系统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此后，刘少奇在5月30日作关于讨论修改党章报告的结论时，又对代表们关心的主要问题逐一加以解答。刘少奇的报告，得到了高度评价。胡乔木曾在忆及这段历史时说：“整个报告都很好，特别是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讲得非常精辟，是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也是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在七大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刘少奇以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全票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继续协助毛泽东为七大路线的贯彻执行而呕心沥血、艰苦奋斗。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在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的重要历史关头，努力做好统战、城市接管等各方面工作，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东北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此后，他又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凯歌行进，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革命领袖
在党的七大前后

红岩不朽英魂存 碧血丹心青史扬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烈士群雕铭文敬读

□ 王 婧

烈士群雕是烈士纪念碑的独特表现形式，展现着革命烈士舍己为国、英勇不屈的光辉形象。由邓小平题名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耸立着一座展现“浩气长存”主题的大型烈士群雕。该群雕于1986年纪念“11·27”大屠杀37周年时落成，高11米，四周各宽7米，雕刻有9位烈士形象，代表着牺牲在集中营的300多名红岩英烈。群雕采用中国传统石窟艺术的“中心塔柱式”结构，由438块红色花岗石以连环组合的方式将其分为四个面，表现出烈士们“宁死不屈”“前仆后继”“坐穿牢底”“迎接曙光”的崇高精神。群雕的右侧，立有一块白色花岗石石碑，碑上雕刻着邓颖超撰写的《烈士群雕铭》，全文如下：

斯烈士陵园，昔军统特务摧残革命志士之魔窟也。溯自抗战中期以迄解放，革命志士囚禁于此者逾千，而壮烈牺牲者累百。尤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重庆解放前夕，军统特务惨绝人寰之大屠杀，一夕之间，殉难烈士竟达二百余人。解放后合葬于此，因建陵焉。伟哉先驱，血沃歌乐，光照神州。建国以来，感先烈之功，怀先烈之义，谒陵扫墓者，络绎于途。一九八一年秋，山城少年倡议捐献建造烈士群雕，以彰百世。市委市府嘉助其行，海内外共襄盛举，历数载而厥工告成。磐磐坚石，赫赫群英，仰雄风之再现，留浩气于永存，励后进以壮志，兹新征其兼程。值兹隆礼奉立，谨述大略，勒石以铭。

邓颖超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碑文叙事简洁，激昂悲壮，记录着国民党军统特务在重庆歌乐山囚禁、屠杀大批狱中革命志士的罪行，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缅怀红岩英烈、传承

红岩精神的崇高风范，读来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1939年至1949年，以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为主的重庆歌乐山军统集中营，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囚禁和屠杀中共党员、抗日爱国将领、民主人士及其他革命志士的秘密监狱。解放战争时期，被称为“两口活棺材”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其关押人数、酷刑程度、屠杀规模，均超过抗战时期。譬如，1947年至1949年，重庆“六一”大逮捕案、“小民革”案、“挺进报”案、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的革命者，如江竹筠、李青林、何雪松等，长期被囚禁在渣滓洞监狱，直至屠杀。著名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中共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川东特委青委委员、宣传部长许晓轩，重庆地下党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等，都被囚禁在白公馆监狱，直至屠杀。

这些英勇就义的红岩英烈，以“誓把牢底坐穿”的坚定信念和不屈意志，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和重庆的解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

重庆解放之前，国民党特务在歌乐山军统集中营对革命志士实施了分批屠杀，主要集中在1949年9月6日、10月28日、11月14日、11月27日、11月29日。殉难者中牺牲的民主人士、进步群众与共产党员一起为了新中国的事业，并肩战斗、共赴生死。这其中，距离重庆解放的前三天，国民党当局在溃逃之际，对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的革命志士实施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殉难人数高达200余人。在渣滓洞大屠杀中，国民党特



务改变了原来分批枪决的计划，把余下的革命志士集中关押在男牢1楼8间牢房里进行机关枪扫射。那一瞬间，胡作霖、陈作仪、张学云、李泽等革命志士用身体去堵枪口，与特务展开搏斗，为其他狱友提供了逃生的机会，最后有15人脱险。

在白公馆大屠杀中，由于监狱看守杨钦典被我党策反，罗广斌等20人脱险。“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这些铮铮誓言表达了红岩英烈对党组织的绝对忠诚，对党的事业的无私奉献，对人民群众的无比热爱！

红岩英烈是红岩精神的传承者和传播者。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培育形成了红岩精神，成为狱中革命志士坚定党性的精神本源。1948年4月至1949年11月，面临川东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的严峻形势，被捕入狱的革命志士无惧生死、坚持战斗。他们本着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在狱中临时党支部和革命骨干的带领下，围绕“忠诚与背叛”“党内教育与实际斗争”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潜伏敌营二十载的丁行

□ 刘 慧

战斗口号：“第三十一师誓与台儿庄共存亡！”部队进驻后，丁行带领战地服务团立即开展作战动员，印发对敌宣传材料，在要道口为行军路过的官兵们演唱《大刀进行曲》，提振部队士气。服务团还在各村召开群众大会，作抗日讲演、唱抗日歌曲、演短剧，组建民众担架队、慰问队等支前队伍，支援前线抗战。台儿庄战役打响后，服务团组织协助运送弹药，送水送饭，接收运送伤员，为前线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艰苦鏖战，台儿庄取得大捷。丁行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率领战地服务团为战斗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9月，为争取池峰城团结抗战，中共中央中原局计划派遣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代表与池峰城谈判。池峰城迟疑不决，丁行竭力劝说，最终促成了秘密谈判。第二年年初，因叛徒出卖，军中有地下党员的情况暴露，丁行掩护同志们安全撤离，被迫离开了池部。

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为中共传递情报

丁行离开池部后来到重庆，党组织指示他要继续在国民党军队潜伏。1942年，他来到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身边任秘书一职，同时暗中宣传革命、发展党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孙连仲负责华北地区平津、河北等地的日军受降和接收事宜。丁行跟随孙连仲前往华北地区，担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区长官司令部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兼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到达北平后，丁行很快投入到由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指导和

发展的华北地区情报工作中。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党组织指示，丁行等人留在北平，用秘密电台联系，“更深深地埋入地下”继续隐蔽。白色恐怖之中，好友和亲属曾劝他暂避一下，他却说：“我的战友们正在出生入死地战斗，我岂能当一名可耻的逃兵！”

在极端恶劣危险的处境下，丁行坚持为党组织搜集情报。凭借身份他能看到很多机密文件，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上的人员编制、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等，还有经济、物价等方面的情报，都被他及时传递给党组织。一日，保定绥署在高碑店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他把有关华北的军事布防，以及北平保安部队驻地、仓库、据点和装备的情报，详细记录后，电报给党中央。

除了收集情报，丁行还发挥军法处副处长岗位的有利条件，为党的事业出力。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往往从丁行“主管的军法处的前门进去，从后门就出来了”。

丁行还以笔为枪，给进步报纸和刊物写社论和文章，利用公开渠道巧妙宣传革命。1947年3月，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被改编为保定绥靖公署，驻地从北平迁移至保定。丁行来到保定后，以“何彭”为笔名撰写《在内战最前线》，发表在国统区的进步刊物《观察》上，从各个角度戳穿国民党统治的“画皮”，受到有识之士和广大群众的赞赏。

坚贞不屈以身殉国

1947年9月，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北平情报组织的地下电台在交道口京兆东街24号被国民党侦破，电台负责人李政宣被捕后叛变，致使潜伏在绥靖公署的数十名

“作风与党性”“整顿与惩办”等重要关系展开了深刻的讨论，嘱托最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他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把东西交给党组织，这就是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完成的3万多字的报告——《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狱中八条”是这份报告的精华内容，又称为“狱中意见”，体现了红岩英烈崇高的党性修养。其中，前六条是导致川东党组织大破坏的六方面问题，主要集中在领导干部层面，涉及理想信念、党性修养途径、对党忠诚要求、“左”倾认识、对敌斗争本领、作风建设等问题，均与党性修养不足有关。第七、第八条是解决办法，首先，通过整党整风等思想教育方式解决问题，其次，对严重违反党规党纪的党员、干部必须坚决惩办。这份血泪嘱托是红岩英烈用鲜血和生命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为广大党员敲响了“党性修养一刻也不能松懈”的警钟，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共产党员被捕，进而牵连到西安、兰州、沈阳、承德的情报组织，涉及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中共情报战线遭受重大损失。当时丁行还在和其他战友秘密策动孙连仲起义，已经初步有了眉目。得知消息的丁行，一方面为了不使整个工作计划过早泄露，一方面为了掩护其他人转移，并没有选择离开。29日下午，丁行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带走，羁押在北平的河北军人监狱，两个月后被转移到南京。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轮番提审，丁行大义凛然、顽强不屈，丝毫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在狱中，丁行与各位难友团结在一起，带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敌人坚持斗争。他还逐字逐句教大家唱讽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歌曲《古怪歌》，表达誓要推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决心。

丁行被捕后，妻子蒲洛宇早产生下一个儿子。丁行给儿子取名“令吾”，希望自己能早日从“囹圄”中走出，见到“令吾”。

1948年9月13日，丁行收到妻子寄来的儿子的照片，回信中他深情地写道：“小东西吃（得）很胖，样子很活泼，可见您抚养孩子还有办法，颇为欣慰。”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孩子的舐犊深情，以及对妻子的敬重和谢意。

对家人虽有挂恋不舍，但丁行初心不改，铁骨铮铮。1948年10月19日，丁行毅然走上刑场，与谢士炎、朱建国、石淳、赵良璋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党史人物